

明代北京文化的特色及影响

文/董焱

摘要：明代以农耕文明为主，显示出重要的地域特征，北京城市性质的转变，也给明代北京文化带来变化。西学传入的重要影响，明代宫廷文化下移至民间，促进了民间文化的繁荣，与此同时也引导了清代民间文化的繁荣。可以说，明代北京文化，不仅是中国封建社会文化的一个缩影，也奠定了明清两代五百多年封建文化的基础，促成了明清两代北京文化的繁荣。

关键词：农耕文化；地域特征；西学传入；宫廷文化下移

元代起于游牧民族，虽然建京大都后，十分重视农业生产，但元代帝王在大都的统治体现了多元性，使得牧业、渔猎业、农业文化并存于大都。明朝的建立者，原本就是农耕文化的传袭者，这使得农耕文化在整个明代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尊崇，并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农耕文化的鼎盛，表现为农产品的极大丰富和商品化，农业技术的推广和应用。而这些首先需要有一个稳定的政治环境和惠农政策。明初，由于多年战乱，北平地区出现了大量荒田，人口稀少。明王朝为了鼓励外地农民到北京屯田，颁布了一系列的优惠政策。洪武时：“凡官给牛耕者，请十税五；自备者，十税三。”而永乐时，成祖迁都北京，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北京的农业生产，恢复幽燕的经济。成祖朱棣采取的主要办法是：一是移民充实劳动力；二是减租赈灾，尽量给予北平地区以比较宽松的经济政策。明初北京地区的移民主要来自山西和江浙。山西向北京移民规模最大的就有三次之多，都是在成祖即位之初，成祖宽北京迁谪军民赋役。

明代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它的地域特征。明朝建国之初，政治文化中心在江南一带，大约主要包括江浙和江西地区，这是自唐宋以来形成的一种经济文化布局。明初太祖建都应天以及北方与北元的战争，更决定了这样一个文化布局。随着明朝统一的完成，这种南重北轻的布局有所改变。但是北方连年的征战，使得经济文化上的恢复困难重重。太祖晚年曾经发生“南北榜”案件，给了北方士子们更多的入仕机会，但南北方文化差异未能因此得到改善。这种情况直到成祖迁都北京后，才开始有所变化。政治中心的北移，带来了大批的江南官僚士大夫来京，这对于北京的文化发展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永乐迁都后，以北京为代表的北方文化得到了长足的进步。永乐元年七月，“徙直隶苏州等十郡、浙江等九省富民实北京。”可以说，明代北京的人口，大约有三分之一来

自会稽。江南人口在明代的北迁，对南北文化交流和北京地区文化风俗的变化，产生了重大影响。这种南北大迁徙，不仅大大充实了北京的经济能力，而且必然带来南北文化的大交流和大发展，为此后北京明清两代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同时，漕运的疏通和发展，对于明代北京文化的发展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不仅京城的粮食及各种物资有赖漕河的运输，而且人口的流动也多是在这些线上完成。随着北京逐渐成为政治和科举考试的中心，除常居北京的人之外，外省来京朝觐、接受考核以及进京应试的士子日益增多。明代会馆的建立，对明北京文化的形成也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京师会馆大致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明初期的发轫期、正德嘉靖至清前期的扩充期、清中后期的繁荣期。明清两代的会馆，对于京师来说，是极其重要的城市公共空间。在这一空间中，来自全国各地的人士汇集于此，彼此交融，成为明清北京史特有的文化现象，“都城之中，京兆之民十得一二，营卫之兵十得四五，四方之民十得六七。”来自全国各地的流动人口都汇聚于此，而主要以南方人口居多。江南各地的民风民俗，饮食、服饰、方言、禁忌等等共同涌入京师，和北京原有的文化相互融合，使得京师之地的文化融入了更多南方文化因子。

在文学艺术方面，南方文化的入京给北京的文学创作也带来了新的文学形式和创作内容。明初的杂剧，继承了元杂剧的基本形式，但由于受到当时明政府的限制，明初的杂剧几乎只能是以正统的忠孝节义的教化戏、历史戏以及神仙戏为主。明代中叶以后，南戏传入北京，出现了兴盛的局面。万历年间，昆腔传入北京，迅速取代了继北曲之后盛行于北京的弋阳腔，博得士大夫和市民的喜爱。于是传奇和杂剧的创作分为两类，一是称为“雅音”的昆山腔；二是称为“俗唱”的弋阳腔。二者在北京共存。万历后期便形成了以昆腔为正统戏曲和以弋阳腔为民间戏曲的基本

格局。而以昆山腔演唱的传奇戏的创作逐渐进入高峰。

在手工业方面,北京的雕漆业源于浙江嘉兴。据《嘉兴府志》记载:嘉兴府张成善于制作雕漆制品,当时闻名乡里。明永乐年间,一日本人将他从海外购得的一件嘉兴张成的雕漆作品进献成祖,深受成祖喜爱。遂后,由张成之子张德刚代父进京传授技艺,从此,雕漆业兴盛于京师。北京果园厂就是明廷的雕漆作坊,这里制作的精美器皿,专供宫廷享用。明代,雕漆业与景泰蓝一样闻名于全国。西方传教士的来京,使明朝人,也使京师之地的人们开始了对西方文化的接触和吸收。这其中利玛窦无疑是影响最大的一个。

万历二十九年(1601),利玛窦被允许“儒服入京”,获准常驻北京传教。当时利玛窦赐第在北京城西南的宣武门内之东。天主教堂建在他的住宅左边,即今天北京宣武门内南堂的起源。他在北京的传教,采取联合儒教,反对佛道的策略。他的传教,对于明代北京城无疑有着深远的影响。

利玛窦在京主要通过介绍西方科学技术来传播天主教,涉及的领域有数学、天文学、地理学等。欧洲天文学输入中国,也始自利玛窦。他来华后,先后撰写了《乾坤体义》和《经天该》,又和李之藻合译了《浑盖通宪图说》,这也是中国人介绍西洋天文学的开始。这些西方的天文学和数学,是明末清初西洋科学输入中国的重心,得到了当时学者的广泛关注。《崇祯历法》137卷就是传教士和徐光启、李之藻、李天经等人共同完成的。该历法奠定了我国后三百多年历法的基础。利玛窦同时也是将西方新地理学知识传入中国的第一人,集中体现在他绘制的各种世界地图中。他在地理学专名厘定方面的一个贡献就是证明了《马可·波罗行纪》中所谓的“契丹”就是中国,“汗八里”就是北京。除此之外,利玛窦还将西洋的绘画、音乐、语言传入中国,他是全面介绍西洋文化的第一人。与此同时,利玛窦还将中国的典籍翻译传播到欧洲,为中西文化交流史构筑了一座桥梁。除利玛窦之外,明代来华传教具有一定影响的还有熊三拔、阳玛诺、汤若望、邓玉函等人,他们还给明代的北京带来了物理学、枪炮铸造等技术。西学的输入恰逢王阳明心学盛行之时,客观上为西学的传播创造了一种自由宽松的文化氛围,同时也为士大夫取道西学提供一定的思想准备。因而,明中叶以后,诸如早期启蒙学说、东林学派和科学思潮等各种进步的社会思潮,都可以找到它们同西学契合的地方,使得西学成为明清之际思想文化领域一股不可轻视的力量。

明成祖迁都北京,使之成为明代的政治文化中心,北京城市性质的转变,奠定了明北京文化的权威

性和正统性,皇家文化一直为清代所继承。明代北京营建的大量建筑,宫廷坛庙直接为清廷袭用,同时,皇城在修建过程中融入的中轴布局、左祖右社、天人合一的思想也为清代承袭下来。祭祀礼制上,清代延续了明代的祭祀制度,将诸祀分为大、中、小三等。明代兴起的会馆,作为都城的公共空间,一直为清代沿袭,并在清前期得到扩充,于清后期发展繁荣。明代漕运的疏通,也为明清两代人员的往来提供了便利条件,使得北京的文化融合荟萃了全国各地的人文信息,饮食、风俗、方言、禁忌、服饰、艺术等等同时集汇于京城。

明代确立的科举取士制度,不仅确立了明代北京的文官文化,也直接为清廷提供了选拔官吏的机制。明清两代文化的普及也有赖于此。明代设立的文庙和国子监,也为清代继承下来,自世祖顺治帝始,历代清帝都要到文庙祭奠孔子,至国子监临雍讲学。明代顺天府学编制、旧址及建筑一直为清廷所沿用,所不同之处在于清代顺天府学还招收八旗生员。明清文人在名谓方面追求训雅好古之风相以为继。明清两代在实际生活和文人文集中,往往不直接称某人的正式官位,代之以古称。

在学术思想方面,明代是“心学”集大成的一个时代,也使得明代的学术在中国的学术史上与众不同。万历之后,随着利玛窦入京带来了西方的自然科学,给京师的学界带来了一股新的学风。至明末,开始对王学(即王阳明心学)末流空谈心性而不务实学的反思,实学就此兴起。这一学风,延续至清,引导了清初实学的新风。

明代宫廷文化下移至民间,促进了民间文化的繁荣,与此同时也引导了清代民间文化的繁荣。可以说,明代北京文化,不仅是中国封建社会文化的一个缩影,也奠定了明清两代五百多年封建文化的基础,明清两代在皇家的祭祀礼仪、科教文化、商贸生产、手工制作诸多方面一直沿袭下来,共同构成了明清北京文化的主要内容,也促成了明清两代北京文化的繁荣。

参考文献:

[1]于慎行.《谷山笔麈》卷十二,《明史资料丛刊》(第三辑)[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3.

[2]李宝臣.北京城市发展史·明代卷[M].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8.

[3]费赖之著,冯承钧译.入华耶稣会士列传[M].上海:上海土山湾印书馆,1938.

(作者单位: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历史所)